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6.03.003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金菀.由湘江战役探寻中国共产党革命形象塑造——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探索[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172-180.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6.03.003.



**Citation Format:** Xu Jinyu. Exploring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Xiangjiang Battl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event system theory[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6(2): 172-180. Doi: 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6.03.003.

# 由湘江战役探寻中国共产党 革命形象塑造 ——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探索

徐金菀

(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广西 桂林 541100)

**摘要:**政党形象是政党在具体历史实践与重大事件中塑造而成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实干担当塑造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整体形象。因此,从解析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入手,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问题的必经之路,也是正确之路。事件系统理论,以事件为基本单元,从强度、时间、空间维度揭示事件的独特性、影响范围和力度,促进实体改变或创建新的行为、特性或激发后续事件。文章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湘江战役何以成为值得探讨的对象,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党在这一过程中展现的政党形象:浴血苦战坚守理想信念、恪守为民利民初心、勘误纠错勇于自我革命。将事件系统理论引入党史研究,能突破传统宏大叙事的单一框架,在具体事件的微观分析与政党形象的整体建构之间建立关联,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微观但坚实的历史依据。因此,无论从湘江战役个案还是党的形象塑造研究视角,都可谓一次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湘江战役;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事件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6)02-0172-09

## 引言

湘江战役,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和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2021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广西桂林时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政党形象,是政党在践行性质宗旨、实现理想目标等过程中,通过具体实践活动逐步塑造出来

**作者简介:**徐金菀,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目前主要从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工作。

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史中,经过一系列具体实践,塑造了伟大、光荣、正确的整体形象。由此可见,以解析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来探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问题,既是必经之路,也是科学认识的正确路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sup>[1]309-310</sup>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其形象塑造与传播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必然也遵循一般的公共组织形象管理与传播规律。事件系统理论是研究组织和管理的一种新颖理论,它以事件为导向,通过事件强度、时间、空间三个维度属性揭示事件如何变得富有意义及其影响力。因此,从重大事件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问题则是事件系统理论运用的合宜领域,这为从事件角度观察分析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关于湘江战役,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例如,石仲泉在《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借史鉴今,阐释了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sup>[2]</sup>;汤志华和兰岚认为湘江战役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和清算“左”倾错误,这为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准备了条件<sup>[3]</sup>;甘庆华认为湘江战役促使广大红军将士对中国革命进行反思,抛弃了教条主义,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点<sup>[4]</sup>,等等。但是,目前既未有研究以重大事件为切入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进行尝试,也未有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形象角度来解读湘江战役这一中国革命史和党史上的重大事件。

本文创新性地运用事件系统理论解剖湘江战役,让政党形象研究从宏大叙事落到了可触可感的关键事件上,从事件强度属性、时间属性、空间属性三个维度对湘江战役的形象塑造力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剖析。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事件系统理论的应用边界,突破了湘江战役囿于传统视野的局限,更以事件驱动的动态视角,从具体事件出发分析,回应了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中系统性刻画的不足,为理解重大历史事件与政党形象建构的互动机制提供了一个兼具整合性与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可谓一次有益的探索。

## 一、理论基础及机理分析

事件系统理论(event system theory, EST)由 Morgeson, Mitchell 和 Liu Dong 于 2015 年提出,认为事件是动态的,可能变得强大到在行为或特性中产生更改或可变性,并可能导致后续事件,通过这种方式,事件可以形成更大的事件链,跨时间影响组织;同时,事件具有情境性,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有很强的时空属性。该理论强调以动态视角从事件强度、时间和空间属性三个维度揭示事件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三种属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体如何改变或创建新的行为、特性或激发后续事件<sup>[5]</sup>。本文沿用事件系统理论的基本思想,相关概念具体如下。

一是强度属性。包括新颖性、颠覆性和关键性三个维度,三者以叠加方式合流成为决定一个事件的总体“强度”,强度越高,愈加影响实体改变,引发变革或创造新的行为、特征和事件。

新颖性是指事件与当前和以往行为、特征和事件的差异程度;差异程度越大,越容易引起实体对事件的深入信息加工,从而促进行为、特征和事件的创新与变革。

颠覆性是指事件对实体常规活动的扰乱、颠覆,为了应对这种强烈冲击及改变,实体对信息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调整或改变现有的行为模式或特征。

关键性是指影响组织优先应对程度及组织目标实现的显著程度,并因此触发额外分析和变化。事件越关键,越需要异常的关注和行动,新行为、新特征和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二是空间属性。事件发生的空间层次及其影响在纵向(向上向下)、横向(同层级)上的传播,强调了事件源与事件链的动态裂变过程,主要包括起源、空间方向(扩散范围)、事件距离(与实体距离)等维度。

空间方向是指事件向其他层级移动、影响的扩散范围,就是事件可以对行为、特性或后续事件产生的单一层次结构的影响,可以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直接影响,也可以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调节作用。

事件起源是指事件的根源或所处的初始层级。事件强度相等时,发生层级越向上,影响范围越广,因此,事件强度对事件结果的影响可能依赖于事件的起源。

事件距离是指事件发生与实体在组织中的空间距离,距离会削弱事件强度对事件结果的影响,事件距离某个层级越近,则对该层级的影响程度越深。

三是时间属性。事件动态经历所需要的时间跨度、时机准备和事件发展趋势之间的动态演进,包括时机、时长、强度变化等,是衡量事件影响力与历史穿透力的重要维度。其中,时机是指事件发生的时宜或容易引起事件强度属性变化的时间节点;时长是指事件持续的时间跨度;强度变化是指随着时间推移,事件与环境或实体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事件作用力及力度的变化。

## 二、事件系统理论下湘江战役的属性分析

### (一)时间属性

从时机上看。由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军队继续“追剿”,中央红军也持续处在“左”倾错误的领导下,这不仅使红军丧失了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的宝贵时机,更严重的是给了国民党调兵遣将构置新封锁线的时机。于是,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利用湘江天险,调集近30万人在中央红军周围部署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只等中央红军去钻。湘江战役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从时长及强度变化上看。所谓“当其时,作其事,便是能随时”<sup>[6]</sup>。湘江战役,就持续时长而言,历时天数为7天左右<sup>①</sup>,作战行动呈现短时段、高烈度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与现实考验,促使党在实际应对中反思问题并逐步觉醒,为最终召开遵义会议及时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有利时机;同时,突破湘江防线后进入桂北民族地区开展的民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性推行民族工作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机遇。因此,尽管战役本身持续时间有限,但在历史时间维度上产生了长时段、持久性的影响效应,其引发的思想觉醒贯穿了此后的长征进程乃至党的长期发展。

### (二)空间属性

从起源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目的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西进途中,接连突破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后,进入湘南汝城地域,这时蒋介石也弄清了中央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精心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

从扩散范围看。中央红军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经全州、灌阳、兴安三县之间地带,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付出了巨大牺牲,在全州、兴安间西渡湘江,进入苗族、瑶族和侗族等聚居的桂北地区,这是长征开始后第一次途径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坚持以民为本,开创性推行民族工作,不仅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认同,也为之后的民族工作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传播了革命

<sup>①</sup> 湘江战役历时天数,学界说法众多,本文采用7天一说,参见:何成学《有关湘江战役若干问题之我见》,《广西党史》1995年第2期,第24页。

真理,播撒了革命火种,“在解放战争中,桂北最早出现的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就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龙胜东北部的江底、泗水、马堤、瓢里、平等等地”“在游击战争中,侗族青年参军的达三百多人”“龙胜东区人民政府和北区人民政府,是解放战争时期桂北唯一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sup>[7]53</sup>,推动革命事业开枝散叶、蓬勃生长。

湘江战役的惨重代价,促使党和红军内部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反思扩散到了更多的干部群众。“左”倾阵营在毛泽东同志的帮助教育下发生了分化,代表人物王稼祥、张闻天从中摆脱出来,有助于扩大正确路线的影响力。许多指战员也纷纷不满:“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忿忿地说……现在光挨打,真气人!”<sup>[7]402-403</sup>

从与实体距离看。涉及主要实体是中央红军及其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等,国民党及其领导人蒋介石。中央红军方面,长征前夕,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指挥“三人团”,李德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与博古同为“左”倾领导者,不顾实际情况,继续奉行“左”倾教条主义。国民党方面,长征开始之前,蒋介石为彻底“剿灭”红军制定了“铁桶计划”,但尚未来得及实施,于是在红军西进途中又凭借湘江天险精心设置了与“铁桶计划”目的相同的“口袋阵”,对红军“前堵后追、两侧夹击”。

### (三)强度属性

从新颖性看。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尚未弄清红军的战略意图,担任“追剿”的敌军力量分散,唯一能够立即投入堵击红军作战的粤军陈济棠部与红军签订了协议不愿正面堵截红军,前三道封锁线比较顺利地突破了。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完全判明了红军西进的真实意图,更严重的是,红军行进速度迟缓给了国民党开进、集结的时间,国民党精心构置了更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在湘江地域对红军展开规模空前的进攻,红军将面临更加严酷的战斗。

在湘江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这是长征时期最早民族政策文件。渡过湘江进入桂北地区后,红军开启了直接与少数民族面对面接触的历史性时刻。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研究和解决革命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颠覆性看。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损失惨重,正如杨尚昆同志所说:“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sup>[8]</sup>,这“血的事实逐步使大家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我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sup>[7]34</sup>。在这种觉醒的逐步推动下,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最终,在遵义会议上宣告了这条路线的破产,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人,让中国革命从“左”倾错误中摆脱出来,驶上正确航道。

从关键性看。首先,湘江血战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保存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保存了党的建党建政的领导骨干;保存了党的治军领导骨干”<sup>[9]37</sup>,使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其次,在如此恶劣的险境中,广大红军将士坚定革命理想信念,以压倒一切的英勇气概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为熔铸伟大长征精神提供了重要元素。最后,从认识论角度看,渡江的惨重代价,加快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转变过程,“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特别是对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彻底清算准备了客观历史条件”<sup>[10]</sup>,在推动中国共产党走向政治成熟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上述分析,从时间、空间和强度属性三个维度全面揭示了湘江战役的独特历史特征及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重大事件不仅推动中国共产党开创性开展民族工作,践行为民利民的初心使命,更促使中国共产党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正确道路。基于

此,将进一步探讨中国共产党在应对此次事件过程中,塑造出了何种具体而鲜明的政党形象。

### 三、由湘江战役探寻中国共产党塑造而出的形象

#### (一)强渡湘江:铸就坚守理想信念的政党形象

面对蒋介石精密部署的铁三角“口袋阵”,广大红军将士始终坚守理想信念,永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担当,浴血冲锋、向死而生,最终强渡湘江。

##### 1. 迎敌破“阵”,彰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担当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总政治部发布命令,号召红军“要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障碍,为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而奋斗”<sup>[11]61</sup>。红军将士服从命令,直面迎敌,与敌军展开了四大阻击战:兴安光华铺阻击战、全州脚山铺阻击战、灌阳新圩阻击战和后卫阻击战(水车阻击战),构成红军渡江的生命线。

11月27日晚间,红军一、三军团前卫师已占领从界首至屏山渡30公里湘江两岸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光华铺、脚山铺两大阻击战发生在湘江地域,就是为了扼守过江渡口,保护渡江地点安全。光华铺,先由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四团占领,作为阻击桂军北上封锁湘江的阵地,随后由红三军团第四师前锋第十团接手。这一地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但十团将士固守阵地,顶住了桂军的进攻,胜利完成了阻击桂军的任务。脚山铺,位于全州以南8公里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延伸,在脚山铺处与两侧连绵8里长的小山丘相交。作为阻击湘军南下掩护红军抢渡湘江的阵地,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第二师的第四、五、六团与南进的国民党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战斗,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湘军部队一度打到了红一军团指挥所的面前,双方几度展开白刃战,红一军团顶住了飞机、大炮的猛烈进攻,保证了湘江渡口的安全。新圩,是整个红军队伍从雷口关、永安关进入广西后前行到湘江渡江点的枢纽地段,新圩阻击战就是在左翼保护通往湘江的生命通道。红三军团第五师李天佑部第十四、十五团在新圩抗击桂军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虽然桂军部队素有“打仗像饿狼”的称号<sup>[12]45</sup>,但红军誓与阵地共存亡,阻击战激烈进行。红三军团第六师未能及时赶到新圩接防,第五师苦战三天两夜,没有让桂军前进一步。后卫阻击战,在三大战场激战之时,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边打边撤,顶住了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攻击,保障了全军的行动,掩护红军主力过江。

至12月1日,四大阻击战中红军以重大伤亡代价,撕破了“口袋阵”,红军主力得以渡过湘江,进入西延地区,实现了战略上的突破。

##### 2. 浴血苦战,坚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

面对国民党“口袋”似的围追堵截,红军将士浴血苦战,尤其是在“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sup>[7]32</sup>的感召下,广大红军将士不惧牺牲、血战到底。

脚山铺阻击战中,身患疟疾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沙耿飏,因“发病打摆子,忽冷忽热”,身体虚弱,但却说什么也不肯休息,带病也要站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sup>[13]</sup>,面对敌人的包围,大喊“拿马刀来”,率领士兵扑过去与敌人格斗<sup>[14]</sup>;在“一切为了苏维埃新中国”的支撑下,身负重伤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为不做俘虏,决然饮弹自尽。光华铺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打得英勇,战斗了两天两夜,打退了敌人十多次冲锋,团长沈述清和继任团长杜宗美相继壮烈牺牲,红十团付出了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sup>[15]</sup>。新圩阻击战中,红三军团第五师参谋长胡震“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到新圩”,最终他和第十四团团长沙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牺牲,第十四团政委和第十五团团长沙,政委负重伤,两个团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奉命赶到新圩接防,在掩护八、九军团通过古岭头地域后,陷入桂军

的重重包围中,炮弹用完后,就用大刀砍、用刺刀拼杀、用枪托砸,除少数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最终喋血古岭头。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作为全军后卫,处境最危险、打得最苦,师长陈树湘不幸被捕后,断肠明志,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为了革命理想,即便受制于“左”倾错误决策,且又身处极端险恶的环境,广大红军将士仍视死如归、一往无前,以鲜血和生命突破了湘江封锁线,打通了西进战略通道。在这一血火淬炼的历程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秉持崇高理想、坚守坚定信念的鲜明政党形象。

## (二)凝聚民心:筑牢为民利民的人民性形象

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沿湘桂边界继续西进,不畏艰难险阻翻越了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桂北民族地区,所遭遇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与苏区时期有着天壤之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立足实际,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卓有成效地开展民族工作,消除民众疑虑、播撒革命火种,进而赢得各族群众的认同与信任,凝聚民心,为革命事业筑牢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1. 因地制宜,颁布正确的民族政策

1934年11月19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湖南时就发布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进入广西后,又发布了更具体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它是中央红军通过桂北民族地区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同一天,还发布了《对苗瑶民的口号》共13条,生动地展示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民族政策等。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具象化了<sup>[16]44</sup>,反映了共产党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6]42</sup>。

### 2. 模范守纪,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在和群众面对面的接触中,党和红军的言谈举止,直接影响到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红军严格执行铁的纪律,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妇女,关心群众疾苦,打土豪为民除害,切实维护群众实际利益。例如,对于敌特纵火烧毁民众财物,嫁祸于红军的恶行,红军为了保护群众,打击敌人,采取了坚决有力的措施:凡发生火灾,不论军情如何紧急,都要奋力抢救;给受灾群众发放救济款,仅在龙坪寨一地,红军就发放救灾的光洋两千多元,群众深为感激;严惩纵火犯,在群众大会上将龙坪大火时抓获的纵火犯当场枪毙,群众拍手称快<sup>[7]48-49</sup>。

红军以严明纪律和模范行为展现了优良作风,群众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并自发地进行支援和帮助,做向导、当翻译、送情报等,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收容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军爱民、民拥军,实现了团结有力的“双向奔赴”。

### 3. 加强宣传,激发群众革命热情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sup>[1]136</sup>。因此,尽管是在险恶的战斗和紧张的行军中,红军仍然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为革命胜利培根铸魂。

毛泽东同志说道:“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sup>[17]</sup>标语口号,因简洁易懂成为主要宣传方式,将红军思想与桂北现实相结合,特色鲜明,不仅包括党的性质宗旨、民族政策、抗日主张,同时涵盖关心群众现实疾苦、揭露国民党的卖国罪行等内容。积极散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宣传品,扩大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当年在后勤运输部队运输连担任指导员的老红军谢山龙回忆:“我们所挑的宣传品,在桂北散

发得最多,有时到一个村子就散发好几担。”另外,为激发民众革命热情,支持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红三军团第四师首长在龙胜泗水乡龙舌岩会见了桂北瑶民起义失败后隐蔽在山上的起义首领,向他们宣讲了党的性质、任务及民族政策等,并给予慰问和鼓励,送了枪支弹药给他们。

从根本上来讲,党的形象就是人民群众利益的真实反映,人民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政党形象选择的决定因素。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sup>[18]</sup>红军的这些民族工作使桂北民众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是人民的队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结束少数民族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从而筑牢中国共产党为民利民的人民性政党形象。

### (三)勘误纠错:锻造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政党形象

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sup>[16]</sup><sup>41</sup>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其性质决定了不仅能进行广泛彻底的社会革命,更能进行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下的错误实践,作为萌芽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导火索,从认识论角度看,它是党和红军认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量变向质变飞跃的触发点,促使中国共产党开展自我革命实践。

#### 1. 认识觉醒,奠定纠错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曾谈过纠正“左”倾错误路线要在湘江战役之后的遵义而非中央苏区进行的原因。“左”倾错误的危害性在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了,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尚不清楚。如果在中央苏区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时他们仍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sup>[12]</sup><sup>130</sup>。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的本质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前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丢掉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有湘江战役中,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可谓是既失地于前,又丧师于后。党内同志和红军将士对“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在与长征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比后逐渐深化。正如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中所说:“突围开始以来一个多月的经历,对我们广大的干部与部队指战员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还在五次反‘围剿’中,大家对比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已经对领导上的错误感到担心。这回问题的实质更加充分暴露,再没有怀疑的余地了。”这表明广大红军将士的认识从量变逐渐走向了质变,这种转变为之后遵义会议彻底清算“左”倾错误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 2. 立场转变,提供组织保障

经历了“左”倾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伤害后,中央的领导同志,包括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人,陆续有了觉悟。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教育下,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改变,他们的支持对于纠正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sup>[7]</sup><sup>96</sup>周恩来同志亦说:“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sup>[7]</sup><sup>98</sup>他们的转变,标志着党内“左”倾错误的阵营已经分化,再也无法一手遮天,垄断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了,从而政治上的正确决定,得到了组织上的保证。

在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下,经过不断斗争,最终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上对军委的军事指挥权限和作战指导原则作出了具体规定,直接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

#### 3. 坚持斗争,引领正确方向

开始长征时,毛泽东同志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不断与“左”倾错误路线作斗争,积极进行

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尝试,将中国革命推向正确航道。

在红军渡过湘江沿越城岭山区西进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矛盾,造成黔东南的空虚状态,对红军进入贵州十分有利。但是,博古、李德仍顽固坚持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这个严峻关头,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sup>[11]70-71</sup>。对此,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斗争和动员下,最终在黎平会议上决定转道贵州,“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sup>[19]</sup>。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同志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sup>[9]37</sup>。

最终,遵义会议成功召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sup>[7]98</sup>。这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一次自我完善,使党的自我革命进一步发展,渐渐走向成熟。

正如杨成武在《红军长征过广西》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红军长征过广西“是遵义会议召开的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遵义会议清算“左”倾错误路线进而实现党的自我革新、自我净化奠定了基础,展现了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性阶级的本质,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形象。

## 结语

本文创新性地运用管理学领域中的事件系统理论,打破传统党史研究多注重宏观叙事或文本解读的静态叙事,以事件为驱动逻辑,强调事件本身对实体的“改变”,从事件强度、空间、时间三个维度揭示了湘江战役的特殊性及深远影响。湘江战役对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等均产生了重大意义:保存了革命力量,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实践,促进民族团结与民族地区革命运动;促使党深刻反思中国革命道路,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正确道路。在此过程中,党也塑造出了浴血苦战坚守理想信念、恪守为民利民初心、勘误纠错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形象。可见,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整体形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无数次类似湘江战役的“浴火重生”中逐步锻造出来的。

本研究表明,以重大事件为切入点,以事件系统理论为分析工具,将事件的影响分析与政党形象的建构分析有机整合,突破静态叙事,为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的视角与方法。该方法亦可拓展至党史其他重大事件,通过剖析事件属性、影响机制及效应范围,揭示其对党、红军乃至革命前途的重要意义,进而有助于系统呈现党的形象塑造的全景轨迹,推动政党形象建构的系统优化。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石仲泉. 湘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J].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2):9-11.
- [3] 汤志华,兰岚. 湘江战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论[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5):108-113,158-159.
- [4] 甘庆华. 论湘江战役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影响[D].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 [5] Morgeson F P, Mitchell T R, Liu D. Event system theory: an event oriented approach to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5, 40(4): 515-537.
- [6] 程颖,程颐. 二程集[M]. 王孝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171.
- [7] 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 红军长征过广西[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 [8] 杨尚昆. 杨尚昆回忆录[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3.
- [9] 田玄. 湘江战役史料文丛:工农红军将士回忆录[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10] 潘健,王焕福. 论湘江战役的历史启示[J]. 社会科学家,1996(5):70-75.
-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红军长征史[M]. 2版.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12] 曲爱国,张从田. 长征记[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 [13] 杨成武. 忆长征[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36.
- [14] 耿飏. 耿飏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234.
- [15] 张宗逊. 张宗逊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26-127.
-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8.
- [18]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420.
- [19]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269.

## Exploring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the Xiangjiang Battle: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event system theory

Xu Jinyu

(*Guilin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Center for the Xiangjiang Battle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Guilin 541100, P. R. China*)

**Abstract:** A political party's image is shaped through its concrete historical practices and major events. Over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f struggl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ged an overall image of being great, glorious and correct through solid work and a strong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starting with an analysis of major events in the Party's history is both an indispensable and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studying the image-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vent System Theory takes events as its basic unit, revealing their uniqueness, scope and intensity of influenc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trength, time and space, and driving changes in entities, the formation of new behavi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r the triggering of subsequent events. This paper applies this theory to examine why the Xiangjiang Battle is a worthy research subject and uses it as an entry point to deeply analyze the Party's image demonstrated in this process: upholding ideals and convictions through bloody struggles, adhering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serving and benefiting the people, and daring to correct mistakes and conduct self-revolution. Introducing Event System Theory into the study of Party history can break through the single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grand narratives, establish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micro-analysis of specific events and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image, and provide a micro-level yet solid histo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capable". Thus, this study represents a valuable exploration from bo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Xiangjiang Battle cas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Party's image-building.

**Key words:** Xiangjiang Battl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mage construction; event system theory

(责任编辑 周沫)